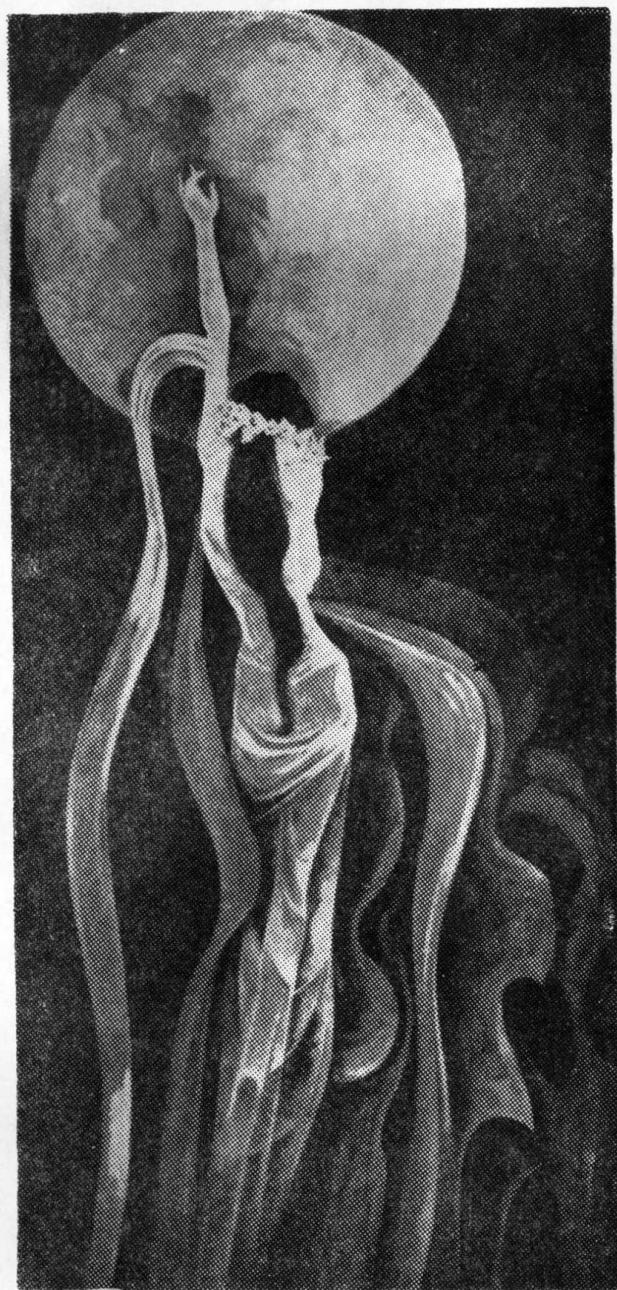


诗探索

1 1980

嫦 城 (油画)



秦 龙

一九八〇年 第一期

目 录

我们需要探索 本刊编辑部 (1)

答《诗探索》编者问 艾 青 (7)

• 新诗发展问题探讨 •

在新的崛起面前 谢冕 (11)

“新的崛起”及其它

——与谢冕同志商榷 丁慨然 (14)

新诗的道路越走越窄吗? 单占生 (18)

诗的漫想三题 刘湛秋 (24)

新诗要进一步民族化 刘汉民 (30)

探索新诗发展问题的意见综述 王光明 整理 (39)

请听听我们的声音

——青年诗人笔谈 张学梦、高伐林等八人 (46)
同小草一起歌唱

——记雷抒雁 匡 满 (59)
从寻找自己开始

——舒婷和她的诗 刘登瀚 (67)

• 新诗臻佳集 •

《铸》 炼 创 邝涵评点 (74)

《无名河》 林 创 想祥评点 (79)

《河汉灿烂》 牧 创 宋垒评点 (85)

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 郭小川 (93)

花和园丁

——诗学札记 雁 翼 (95)

- 让诗在辽阔的诗国自由驰骋 韩 瀚 (104)
诗美学漫笔 闻 山 (108)
人生有限，真诗不死 孟伟哉 (113)
“执刑”之后说写诗 杨 牧 (116)
-

时代的号手

- 在巴黎召开的抗战时期
 中国文学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 高行健 (122)
通过灵魂的窗户 王春煜 (132)
徐志摩简论 凡 尼 (143)
-

·新诗品·

春风与野火的歌

- 读公刘的《离离原上草》 王 睿 宁 瑶 (154)
把长长的身影留在背后 柯国淳 (161)
我国古典诗歌节奏的历史发展及其它 孙绍振 (166)
民歌三变 (壮族) 黄勇刹 (186)
-

·名诗欣赏·

如梦似幻的夜曲

- 《春江花月夜》赏析 袁行霈 (193)
-

《白发苍苍的老好诗人》

- 惠特曼研究散记 荒 芜 (198)
-

·诗通讯·

- 彩云下的友谊 (白族) 晓 雪 (205)
-

·美 术 ·

- 伯乐 (油画) 王怀庆 (封二)
嫦娥 (油画) 秦 龙 (封三)
封面设计 孔 都
-

我们需要探索

本刊编辑部

中国新诗走过了六十年的长途，它业已取得伟大的成绩，它无愧于诞生它的时代。六十年前，新诗从没有路的地方踩出了一条路。我们的前辈是勇敢的拓荒者，他们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六十年后，新诗面临的是崭新的现实：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序幕已经揭开，新生活在我们面前跳动着耀眼的浪花，时代要求新诗传达出它那震耳的声浪，适应它的强大生命力律动的节拍。

肩起时代的使命，为生活的主人呼唤心灵的声音，这对于诗，从来都是没有止境的探索。那种认为已有天才或先知给我们规定了道路，我们不必思考，也无须探索的想法，那种认为一切存在的全都完美，我们不必再有探求，我们的任务仅仅在于遵循已往存在的轨范摆动的想法，是迂阔的。唯有探索，方能前进。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中探索。探索之无止境，正与前进相同。这是已为生活发展的历史，也是新诗发展的历史所昭示了的。要是有一天，我们的诗人和诗评家竟然停止了探索，诗，也就停滞不前了。

不存在永恒的完好，诗也如此；即使有，我们也不能满足于

这种“完好”。五言诗到了六朝，是很完好；七言诗到了唐代，是很完好，要是我们的古典诗人停止了新探索，那就不会有中国古典诗歌一浪高于一浪的向着高峰的发展，它的生命早就终止了。不满足于现实的“完好”，于是才有探索，才能前进。我们深深祈愿这种探索的精神永存。正是因此，当我们考虑给这个诗歌理论批评刊物定名的时候，我们一致选择了这一深刻而富有时代气息的字样：诗探索！

我们需要探索，不仅过去，不仅现在，而且更着眼于将来。我们愿意生活更加美好，我们才需要探索，我们愿意诗更加美好，我们才需要探索。墨守成规永不会有创造。诗人在用诗探索人生和人的心灵。我们，则探索诗，探索诗人从事这一精神生产所达到的和未曾达到的思想与艺术的境界。探索的精神，就是一种思想解放的精神。不满才有改变，改变乃是一种催促前进的动力。我们不是怀疑论者，也不是虚无主义者，我们珍惜一切前人的、包括我们自己的劳作的结晶。但我们不愿守成不变，我们愿意永远地处在这种不断探索的追求之中。

我们追求诗之与时代、生活在思想艺术上的合理的适应，我们只有这个目的。我们认为这种适应，将是广泛的、多样的、丰富多采的。道路不会只有一条，条条道路通罗马。对于艺术，对于诗，情形尤其如此。艺术的探索不存在禁区。应当允许各种各样的、多种道路的探索。对于已经进行过的，例如探求在民歌或古典诗歌基础上的发展，还可进行下去，以使此种实践更见成效；过去未曾涉及的，我们可以大胆探求，这是一种新的探索。一切艺术都贵乎创新。应当鼓励人们勇于探索，让人们在探索的过程中辨真识伪、推陈出新、标新立异。

《诗探索》坚持新诗创造性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了探索新诗继续繁荣发展的道路，我们将通过积极而及时的诗

歌评论以总结推广诗人创作的经验；我们将开展诗歌基本规律的探讨以促进诗歌理论的建设；我们将加强对于诗歌史的研究以增进诗歌发展的知识；我们也将鼓励更多的人们向诗歌美学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我国古典诗论的遗产十分丰富，我们还来不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系统的研究并使之服务于当前；对于外国诗论我们所知甚少，对此也有更广泛地绍介之必要。《诗探索》无疑将以适量的篇幅来刊登这方面的文章。我们希望把诗的理论批评搞得切实些，一切理论，或直接或间接，均将予以新诗的发展有所助益为评价的标准。我们不愿充当老古董或洋货的收藏家。我们深愿《诗探索》是一个始终充满了首创精神的充满了青春与朝气的探索者。我们将时刻警惕不使其因脱离今日诗歌的实际而“老化”起来。诗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有悠久而丰富的传统。人类文化的紧密交流，更是当今变得很小的世界的必然现象。对于传统和外国的东西，我们都要借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利于今日中国的诗歌。

我们生活在现代，我们是作为现代的中国人，在写现代的中国诗。我们认为新诗要有时代感，我们同样认为诗的理论批评也要有时代感。我们站在当代生活的坚实土地之上，我们深深地感到了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

诗歌之有专门的理论批评的刊物，在我国，似乎还是第一次。事情虽然起始于一九八〇年在南宁召开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但究其原由，到底还是为诗本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中国当代的文艺复兴，包括着诗歌繁荣的成绩。全国文艺报刊都刊登诗歌。

《诗刊》再生之后，《星星》、《海韵》，据说还有若干种专门的诗刊物相继涌现，客观的形势呼吁着诗评论专门刊物的应运而生。本刊编者担起了这样的责任，当然是为当前这一兴盛局面所振奋，同时也基于下述两点实际存在的事实：有感于诗歌评论

园地的狭小；有感于诗歌批评队伍的贫弱。上述两点，与诗创作的现状极不相称。我们设想，也这么希望：《诗探索》的出现，也许将有助于略加改变这一明显的比例失调。

在文艺评论的队伍中，最薄弱的是诗评论。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要团结现有的作者。南宁诗会作为一次壮举，恐怕主要在于，它第一次把中国的大多数诗评的力量集聚了起来，第一次把原先各自为战的、分散而互不联系的专门家汇集而为可观的队列。但现有的这支队伍毕竟太小。我们深知，要改变这一状况，没有青年的加入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寄希望于青年。没有青年，便没有未来；没有青年，我们的一切探索，都是徒劳的。《诗探索》决心从创刊开始，就重视来自青年的有生气的、敏感的和尖锐的文章。我们把发现、培养、提高新人的工作，郑重地放在自己的肩上。我们已经有了一支相当宏大的青年诗人的队伍，我们也应当有一支与之相当的青年的诗评家的队伍。而事实证明，后者的建立远较前者艰难得多。

这是一个学术性、理论性与知识性并重的刊物，我们愿意它是适应多方面需要的和雅俗共赏的。我们不愿因它的“雅”而脱离了现实的需要；我们也不愿因它的“俗”而失去理论的深度。在学术性和理论性之外，还要有一个知识性，因为，我们有责任关心青年的兴趣和成长，愿意为这批有希望出现新的人才的广大的读者群，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长期来，在艺术和科学的领域，党所制定的双百方针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今天，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这为我们的探索，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将通过自己的实践，在诗歌战线上，为维护艺术民主，为促进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努力奋斗。我们认为，凡是好诗，不应当只是一个样子的。应当允许读者各有不同的嗜好，诗人也有各具个性的创作风格。我们将不怀成见地重

新评价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只要在思想或艺术上有一定价值的诗人诗作，就给以适当的地位。我们将不忽视那些有自己的独创性而长期受到歧视的不同流派的诗人。

《诗探索》的主张，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三个短语：自由争论、多样化、独创性。自由争论是艺术民主的前提，在学术面前，权威和普通读者是一律平等的。真理总是越辩越明，而且只有用无拘无束的自由争论，才有可能达到多样化并鼓励独创性。我们将在《诗探索》上体现各种不同观点的交锋，我们将欢迎并发表对本刊文章、以及本刊以外的文章、包括本刊编委的著述在内的讨论、批评。我们鼓励说理的批评，更鼓励说理的反批评，我们希望经常保持一种不同意见自由论战的热烈局面。我们想让大家都习惯于生活在这样一种艺术自由民主的空气中，从而确认这是一种正常的秩序。本刊声明：为了贯彻自由争论，来稿凡是说理的和有见解的、而文风又是好的，均将予以发表。一切文章，当然不代表编辑部，即使是本刊编委的文章，也只是代表他个人在发言，文责自负。我们想，这样做，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一点艺术民主的气氛。

诗人的失去个性，长期成了公开的危险，引起了人们的警觉。而评论家的没有个性，情况则更为严重。我们希望本刊的文章能加强同新诗发展实际的联系，杜绝那种徒作隔岸观火的空论，少一点教条气、经院气和八股味，而多一些新鲜的语言、活泼的思想。文风必须改革。

人们的主观意愿，对于一件事业的成功，化为条件，可以是重要的，但却远非是决定的。以《诗探索》的出现而言，尽管这是诗人以及广大诗爱好者长期的愿望，但也仅是愿望而已。愿望而能成为现实，离开了十年浩劫之后的整个事业的兴旺，离开了国内政治气氛的改善，离开了一系列制度的改革，离开了党为我

们创造的这一良好的学术环境，象这样一个颇为专门、属于分工细致的学术刊物的创办，是难以设想的。试想当年，泱泱大国，竟连唯一的一家诗刊都不允许生存，我们怎能不感激这个时代所照临的灿烂阳光！

正是由于时代的热情感召，我们愿意充当诗歌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探索者。我们的刊物将与广大作者和读者携手，共同为加强诗歌研究，活跃诗歌批评，发展诗歌创作，壮大诗歌队伍，为繁荣发展我国多民族的绚烂多采的诗艺术和诗评论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歌德谈写诗

世界是那样广阔丰富，生活是那样丰富多采，你不会缺乏做诗的动因。但是写出来的必须全是应景即兴的诗，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必须既提供诗的机缘，又提供诗的材料。一个特殊具体的情境通过诗人的处理，就变成带有普遍性和诗意的东西。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

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必须由现实生活提供做诗的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的要点，也就是诗的真正核心；但是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都是诗人的事了。

——摘自《歌德谈话录》

答《诗探索》编者问

艾 青

问：你对创办《诗探索》有什么希望？

答：这倒是新发现的一个刊物。诗探索？严肃得很。刊物还没有出来，叫我怎么提希望？没看到，向天空提希望。出来了，我可以提，对封面，对内容，再发表意见。

现在对发展诗歌，各派有各派的理论。各派理论的论争，什么时候都会存在的。我的意见是：让大家吵。没有吵就发展不了诗歌。所以，如果说对《诗探索》有什么希望，那就是希望在刊物上大家都来探索，你探索你的，我探索我的。百家争鸣在一个“争”字。要发展论争。

问：你认为目前新诗创作中有没有倾向性问题？

答：国内外都有各种诗歌倾向。有一种意见，认为看不懂的就是好诗。如是，诗写给谁看呢？诗总要选择自己的读者对象。否则，排除读者对象，那是自己否定自己，是无效劳动。对象没有了，不产生成果的生产叫什么生产？浪费的生产。这问题在欧洲可以存在，如抽象主义，总有少数人可以看。中国人，有些年青人中间，学外国看不懂的诗。看不懂怎么学？学外国的看不懂。这个倾向，我以为是应该排斥的。我们要求自己选择的对

象，必须是能接受自己的观点的。

我的看法是否陈旧了？保守了？诗写出来，大家希望看得懂，因为他总想发表，发表的目的就是让人看懂。话又要说回来，我不懂，我不一定是最高标准。人民都在受诗的教育，我也要不断受教育，今天不懂，明天懂。我不懂，请作者解释，也许能懂，因为写诗人的思考方式有时同看诗人的思考方式不一样。但是总希望诗写得象我们这样的人也能看懂。我算是美其名曰的“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的不懂，“低级”的懂就滑稽了。

问：诗歌是常常谈论现代派，你认为可不可以从中吸取东西？

答：在中国，“现代派”这一称呼是很勉强的。从新月派以后，跑出了一个《现代》杂志，里面各种人都有。鲁迅也在《现代》上发表过文章。戴望舒是现代派，主要写诗。如何吸收？也很复杂。他的诗，有一部分我们可以吸收，那是些用现代口语写的，不押韻，但有音乐性。他的诗是单纯强调韻脚的音乐性的人写不出来的，是现代人的诗。

问：你对诗坛新人有什么看法？

答：对他们的作品我读得很少，没有发言权。新人是指今天以前没有发现的。要拭目以待。一出来就去泼冷水，不好。应该研究青年人的创作。青年人有新的探索的，你去发现了，是好的；他探索到了，你还没有探索到，说明他比你先走了一步。有的青年主张“诗界革命”、“诗界再革命”，其实这类口号清朝末年就提了。

问：新诗以什么为基础发展为好？

答：这很好解决，就让那些主张在古典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的人去发展好了。我不受外界干涉，排除一切理论框框。你觉得要那样发展，你就写嘛，大家喜欢看，就有发展前途；大家不喜欢，前途就没有，有前途也不宽广。以古典和民歌为基础，写得

好的，我们赞成。但你要硬说这是唯一的基础，那是说不通的，至少我这里走不通。我不听什么“应该这么写”“应该那样发展”。没有人向我指过诗路该怎么走。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怎么顺手就怎么写。总之，以一种形式为基础发展新诗是不行的。

问：诗歌界对探索诗美学很感兴趣，你能否谈谈这个问题？

答：美学问题很复杂，触及一切范畴。

举例来说，有人认为诗只有押韻才是美的。这就是一种美学观点。马雅可夫斯基、凡尔哈仑、惠特曼的诗就不押韻。有人写诗，可以称为“论文押韻”，没有一句采取形象思维，你说怎么办？这种人对诗的理解只有一条：押韻。而且说几百年来都是这样。你要说服他得费多大劲！可见美学观念受习惯约束，有时到了很固执的地步。

根据现代美学，哪些是诗？美是要去发现的。譬如，我们就已经发现了不押韻也可以出好诗，而有些人至今还发现不了、接受不了。所以，当我们自己认为美而人家没发现美，或者我们自己没发现美而人家发现美的时候，会有分歧。这时，重要的是要有认真的说服。勇于探索的人，是会发现美的。

美学包括美的哲学、艺术社会学等等因素。诗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中间有相通的东西。完全抽象的诗，不通过具体的形象和比拟的纯属智性的诗，恐怕只有同他一样用抽象方式思考问题的人才能理解。我认为，诗是要通向人民的，必须有具体的东西，人民才会接受。外国可能是因为分工精密，有的诗人可以专门去抽象地思考问题。中国不同，我们的时代常常要求诗人急迫地回答人民关心的问题。我们的时代，人民要求诗人为人民说话。如果你只写自己的东西，你的作品不引起更多的人的共鸣，那么美学价值就很小了。

诗人决不是个体。他后面有背景，有更多的人。有的人只凭

个人短暂的感觉写诗，社会意义又不大，还要强加于千百万读者，即使写得美，也成不了时代的精神财富。现在人民关心什么？那就是：要不要现代化？要不要反封建？封建主义已浸入到我们骨髓里了。现代化离不开政治、思想的民主化。我们要继续和人民一起思考，一起前进。

有的人一说美学价值就用诗集畅销不畅销去衡量。现在最畅销的是幻想小说、福尔摩斯。但它们怎么也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美学的最高标志。诗是文学中比较高级的领域，是文学中的文学。依我看，《诗刊》能卖掉二十万册就不错了，了不起了。

对中国的诗，我并没有“危机”感。我是乐观的。新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起的作用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新诗已经取代了旧诗。很多人是受新诗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有些人不争气，写新诗起家，现在走回头路，自己不承认自己，还要怪新诗“走投无路”，那才是悲剧哩。

一九八〇年七月，北京

在新的崛起面前

谢冕

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由鄙弃帮腔帮调的伪善的诗，进而不满足于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诗集的印数在猛跌，诗人在苦闷。与此同时，一些老诗人试图作出从内容到形式的新的突破，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越来越多的“背离”诗歌传统的迹象的出现，迫使我们作出切乎实际的判断和抉择。我们不必为此不安，我们应当学会适应这一状况，并把它引向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路上去。

当前这一状况，使我们想到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当年，它的先驱者们清醒地认识到旧体诗词僵化的形式已不适应新生活的发展，他们发愤而起，终于打倒了旧诗。他们的革命精神足为我们的楷模。但他们的运动带有明显的片面性，这就是，在当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尽管旧诗已经失去了它的时代，但它对中国诗歌的潜在影响将继续下去，一概打倒是不对的。事实已经证明：旧体诗词也是不能消灭的。

但就五四新诗运动的主要潮流而言，他们的革命对象是旧诗，他们的武器是白话，而诗体的模式主要是西洋诗。他们以引进外来形式为武器，批判地吸收了外国诗歌的长处，而铸造出和传统的旧诗完全不同的新体诗。他们具有蔑视“传统”而勇于创新的精神。我们的前辈诗人们，他们生活在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开放的艺术空气中，前进和创新就是一切。他们要在诗的领

域中扔去“旧的皮囊”而创造“新鲜的太阳”。

正是由于这种开创性的工作，在五四的最初十年里，出现了新诗历史上最初一次（似乎也是仅有的一次）多流派多风格的大繁荣。尽管我们可以从当年的几个主要诗人（例如郭沫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的作品中感受到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影响，但是，他们主要的、更直接的借鉴是外国诗。郭沫若不仅从泰戈尔、从海涅、从歌德、更从惠特曼那里得到诗的滋润，他自己承认惠特曼不仅给了他火山爆发式的情感的激发，而且也启示了他喷火的方式。郭沫若从惠特曼那里得到的，恐怕远较从屈原、李白那里得到的为多。坚决扬弃那些僵死凝固的诗歌形式，向世界打开大门吸收一切有用的东西以帮助新诗的成长，这是五四新诗革命的成功经验。可惜的是，当年的那种气氛，在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再出现过。

我们的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三十年代有过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四十年代有过关于民族化的讨论，五十年代有过关于向新民歌学习的讨论。三次大讨论都不是鼓励诗歌走向宽阔的世界，而是在左的思想倾向的支配下，力图驱赶新诗离开这个世界。尽管这些讨论曾经产生过局部的好的影响，例如三十年代国防诗歌给新诗带来了为现实服务的战斗传统，四十年代的讨论带来了新诗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气象等，但就总的方面来说，新诗在走向窄狭。有趣的是，三次大的讨论不约而同地都忽略了新诗学习外国诗的问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受我们对于新诗发展道路的片面主张支配的。片面强调民族化群众化的结果，带来了文化借鉴上的排外倾向。

当我们强调民族化和群众化的时候，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把它们与维护传统的纯洁性联系在一起。凡是不同于此的主张，一概斥之为背离传统。我们认为是传统的东西，往往是凝固的、不变的、僵死的，同时又是与外界隔裂而自足自立的。其实，传统不是散发着霉气的古董，传统在活泼泼地发展着。

我国诗歌传统源流很久：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的骄傲。正是由于不断的吸收和不断的演变，我们才有了这样一个丰富而壮丽的诗传统。同时，一个民族诗歌传统的形成，并不单靠本民族素有的材料，同时要广泛吸收外民族的营养，并使

之溶入自己的传统中去。

要是我们把诗的传统看作河流，它的源头，也许只是一湾浅水。在它经过的地方，有无数的支流汇入，这支流，包括着外来诗歌的影响。郭沫若无疑是中国诗歌之河的一个支流，但郭沫若却是溶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外国诗歌的优秀素质而成为支流的。艾青所受的教育和影响恐怕更是“洋”化的，但艾青却属于中国诗歌伟大传统的一部分。

在刚刚告别的那个诗的暗夜里，我们的诗也和世界隔绝了。我们不了解世界诗歌的状况。在重获解放的今天，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新诗恢复它与世界诗歌的联系，以求获得更多的营养发展自己。因此有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的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他们是新的探索者。这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也带来了令人瞠目的“怪”现象。的确，有的诗写得很朦胧，有的诗有过多的哀愁（不仅是淡淡的），有的诗有不无偏颇的激愤，有的诗则让人不懂。总之，对于习惯了新诗“传统”模样的人，当前这些虽然为数不算太多的诗，是“古怪”的。

于是，对于这些“古怪”的诗，有些评论者则沉不住气，便要急着出来加以“引导”。有的则惶惶不安，以为诗歌出了乱子了。这些人也许是好心的。但我却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着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

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我也是不赞成诗不让人懂的，但我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即使是不好的艺术，也应当允许探索，何况“古怪”并不一定就不好。对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旧诗，新诗就是“古怪”的；对于黄遵宪，胡适就是“古怪”的；对于郭沫若，李季就是“古怪”的。当年郭沫若的《天狗》、《晨安》、《凤凰涅槃》的出现，对于神韵妙悟的主张者们，不啻是青面獠牙的妖物，但对如今的读者，